

陈望道修辞论集

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陈望道修辞论集

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 编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陈望道修辞论集

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.375 字数:215,000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3,000

统一书号:7276·256 定价:2.30元



陈望道先生在书房

ADD77/05

编辑说明

(一) 陈望道先生是著名的修辞学家，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。早在积极投身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之时，他就开始了修辞教学和修辞学术的研究。在研究过程中，他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注重事实，实事求是，态度严谨，富有创新精神。他留给我们的修辞学术遗产十分丰富，除了作为我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之作的《修辞学发凡》外，还有有关修辞学的论文、讲演、报告等数十篇。论域极为广阔，涉及了修辞学各个部门的众多课题。这些文章或讲话不仅具有修辞学遗产和修辞学史史料价值，而且对于现代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，也有着现实意义。为此，我们将其汇编成集，给读者提供一些阅读研究上的方便；并以此作为对望道先生的一点纪念。

(二) 本论集原则上只收录作者修辞学方面的单篇文章或讲话，但考虑到能更全面反映作者修辞观念的完整面貌，因此也节录了《作文法讲义》、《美学概论》两书中与修辞联系密切的有关章节。

(三) 论集共收文章、讲话六十六篇，分为两部分：第一部分是公开发表过的文章，第二部分是未经发表的作者历年来有关修辞问题的谈话记录；两部分分别按时间顺序编排。第一部分收录的文章，凡发表后经作者修改过的，照修改的收入，作者未曾修改过的，编集时只在个别字句上偶有改动，但不牵涉内容。同时，对原文的印刷错误或其他讹错，尽可能

地作了校正，对有些需要说明的问题，作了必要的附注。有关讨论的文章，为便于读者阅读了解，有的附录了他人相关的文章。第二部分收录的谈话记录虽未经本人审阅，但整理时力求忠于原意，并经过集体校改。

（四）由于水平所限，论集的编录，难免有错讹或疏漏之处，恳请读者惠予指正。

（五）参加本论集编辑工作和整理《关于修辞问题的谈话》的有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邓明以、陈光磊、李金苓、杜高印、李熙宗、范晓、宗廷虎等同志。全书编成后由李熙宗同志统稿。

（六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、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罗竹风同志为本书作序，安徽大学袁晖同志热情帮助联系出版事务，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为论集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。在此，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

1984年3月

高屋建瓴 势如破竹

——为《陈望道修辞论集》作序

罗竹风

陈望道同志的《修辞学发凡》于1932年出版。为了纪念我国修辞学史上这部重要著作出版50周年，1982年中国修辞学会和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隆重的学术讨论会，许多知名之士都发表了意见并写了文章，一致肯定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，复旦大学出版社还为此编辑出版了专书。《修辞学发凡》从汉语的实际出发，搜集了古今几百个作家的800多例句，精选了100多个作家有关修辞理论170段，相当全面地概括了汉语中各种修辞法式，建立起见解精确、系统清晰的理论体系。

我们仍然可以说，就整个体系而言，一直到现在，还没有哪一本修辞学论著能够超过它。《修辞学发凡》的确开创了我国修辞学的新纪元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新体系，在民族化、科学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。经过50多年的检验，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，这是“有口皆碑”的，我不想在这一方面多说什么。现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《陈望道修辞论集》，我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点感想，供广大读者参考。

现在人们经常谈起，首先应当是个革命家，然后才是一个作家。要作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自己的灵魂必须先干净净

净。榜样的力量是最富有说服力的。陈望道同志在中国学术界所树立的光辉榜样，正是从这个“高度”开端的。他生于1890年12月9日，1977年10月29日凌晨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，终年87岁。20来岁就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，30岁左右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锻炼中不断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，一条鲜明的红线明显地贯串终生。不妨这样说，陈望道同志作为革命家的一生，同时也作为先进文化战士的一生，是一直把学术当成锐利武器来使用的。他的知识面很广阔，对文学、哲学、法律、逻辑（包括“因明”）、美学、语言学等都造诣很深，可以说是“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”。但核心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，为革命的需要而使用这些武器，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过是为了革命。

只有从革命的愿望出发，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，从事理论工作，站在时代的最前列，才能高瞻远瞩，成为一个先进的、坚定的革命文化战士。这样所写出来的著作和作品，必然跃动着时代的脉搏，弥漫着青春的气息，摆脱那种迂腐的“头巾”气，不至变成“案牍劳形，皓首穷经”的乡愿！鲁迅从进化论的偏颇中解放出来，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过去文学史上纠缠不清的许多问题，经过历史唯物主义一剖析，便觉清爽爽了。

从陈望道同志的整个历史来看，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“必由之路”，当然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。仅就他一生中的一部分事例，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。根据邓明以同志所编写的《中共党史人物传——陈望道》提供的资料，我们便可以知道个大概。

他6岁入学，16岁以前都在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读私塾，

课余还参加农业劳动。16岁（1906年）入义乌县绣湖小学，18岁考进金华中学，后到上海入补习学校，又在之江大学学习。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，前后4年，曾在东洋大学、早稻田大学、中央大学学过文学、哲学、法律，并获得法学士学位。同时他还进修数学、物理等学科。最重要的是课外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。由此可见，陈望道同志的知识面是很广泛的，根底也是扎实的，特别是课余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对他以后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，从而取得正确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有重大的影响。

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他从日本回国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，便积极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新文化运动，反对旧礼教、旧文学，提倡新道德和白话文，成了当时浙江省的中流砥柱，被反动当局下令“撤职查办”，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事件。1919年底，他回故乡专心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，翻译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。陈望道同志从1920年春来上海之后，帮助陈独秀编辑《新青年》；12月，陈独秀赴广州，他又负责《新青年》杂志的编辑工作。为坚持《新青年》杂志办刊的正确方针，他同胡适之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和鲁迅结成了战斗友谊。

这期间，他还与陈独秀等组织上海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。以后又参加筹建工会和发动工运的工作，亲自到沪西工人夜校和平民女学授课或讲演。1920年至1923年，他在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副刊和由他主编的《妇女评论》上，发表了大量宣传新思想、新道德，提倡新文学、白话文的文章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，他倡导妇女解放和主张社会改革的文章，都是时代的最强音，对反帝反封建、推动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，起过积极的作用。

1921年底，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建立，陈望道同志任第一书记，成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早期领导人之一。

1923年至1927年，陈望道同志参加创办上海大学，并担任中文系主任、教务长、代理校务主任（相当于校长）等重要职务，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、进行革命活动方面，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，有过重要贡献。1927年上海大学停办后，他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直至1931年。自1929年起他又兼任了中华艺大校长。这几年来，他对语文教学有独到见解，注重用新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进行研究，并且写了许多文章，对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、新文艺的方向以及文法修辞科学研究提出了积极有益的意见。陈望道同志从1918年起，就发表了《标点之革新》，是我国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。1922年发表的《作文法讲义》，科学地分析、阐明文章的结构、体制和特征，在当时独具特色，影响很大。为了研究文法修辞，他还对美学、因明学、伦理学等等进行研究，并著有专书。

陈望道同志努力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学说和新兴文艺理论，翻译出版过《艺术简论》、《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》、《社会意识学大纲》、《苏俄文学理论》、《艺术社会学》等外国著作。为了“有阵地”作战，从1928年起，他还参与创办大江书铺，编辑出版《文艺理论小丛书》、《艺术理论丛书》，发行《大江》月刊和《文艺研究》季刊，对介绍宣传科学的文艺理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他积十余年研究的成果——《修辞学发凡》，1932年也由大江书铺正式出版，从而开创了我国修辞学的新局面。

1934年6月，陈望道同志与沈雁冰、叶圣陶、胡愈之、陈子

展等针对国民党的“文言复兴运动”和“读经尊孔”等反动思潮，发动了“大众语”运动，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群众口语，从而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“大众语”和“大众语文学”。这是继“五四”运动提倡白话文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语文大论战。它为以后的“新文字”运动（“北方话拉丁化方案”）开辟了道路。“大众语”运动和“新文字运动”自始至终都得到鲁迅和瞿秋白的大力支持，并受到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和拥护。可以说，它是汇合到抗日战争文化启蒙运动洪流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。

三十年代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，在国民党“不抵抗主义”的掩护下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，所谓“国亡无日，万众悲愤”，但当时那些“帮闲”文人如周作人、林语堂之流，却悠然自得，提倡消磨志气、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“幽默”，于是《论语》、《宇宙风》、《人间世》一类“只谈风月”的刊物便笼罩文坛。为了扫荡这种弥漫一时的迷雾，使广大读者“睁开眼睛来看现实”，于是创办清新、泼辣的《太白》半月刊，首创“科学小品”新文体，开辟“掂斤簸两”新栏目，专登匕首式的杂感，并首倡采用民间的“手头字”。这在当时都是别开生面、独树一帜的，因而赢得鲁迅的称赞和表扬，认为“……现唯《太白》、《读书生活》、《新生》三种，尚可观，而被压迫也最甚”。《太白》战斗了一年，出了两卷24期，最后也被迫停刊了。

1937年6月，陈望道同志辞掉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职务回到上海，参加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，从事抗日救国运动。1938年在地下党办的夜大学“社会科学讲习所”任课。同时，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，发起和组织“上海语文学

会”和“上海语文教育学会”等进步语文团体，并热情支持“上海新文字研究会”，帮助青年纠正废除汉字等过“激”的提法，成为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，亲自主编地下党报纸《译报·语文周刊》，还在拉丁化新文字理论刊物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文章，写了许多有关语文改革的论著，如《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》、《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》、《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》、《从“词儿连写”说到语文深入研究》等。

1940年秋，为避免日、伪迫害，陈望道同志从上海经香港转重庆，在迁校后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。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、代教务长等。他和地下党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，支持帮助进步学生运动，还亲自募捐筹款兴建了“新闻馆”，成为全校进步学生活动的中心，曾请周恩来、邓颖超等同志同大家见面。抗战胜利之后，1946年6月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。他积极配合地下党工作，保护和支援革命师生，投入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斗争。在1947年又发起成立“中国语文学会”。解放前夕，他负责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（简称“大教联”）的工作，团结和组织广大教授参加反内战、反饥饿等民主革命斗争，直接配合并迎接了上海的解放。

全国解放后，陈望道同志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，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在复旦大学任教，作为校长，在主持全校校务的百忙之中，还建立了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，亲自指导文法、修辞的有关研究工作。他还担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，上海语文学会会长，主持《辞海》的修订工作。

陈望道同志数十年如一日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

传播，他是“先行者”之一。处于黑暗浓重的旧中国，压在亿万人民头上的是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“大山”，因而反帝反封建就成为头等重要的革命任务了。提倡妇女解放，组织工会，用群众的怒吼回答反动统治者的压榨，从这两环作为突破口，显示出他的真知灼见。而要具有这种真知灼见，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武器，陈望道同志正是从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印证，于是高屋建瓴，势如破竹，在每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中，他都站在时代的前列，例如在“五四”运动时提倡白话文、新文学、新道德，在“九·一八”前后提倡大众语运动和新文字运动，把思想革命的内容同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，而这也正是为适应革命形势和广大群众运动的迫切要求，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，问题是在怎样去发现和掌握它罢了。

陈望道同志研究文法，研究修辞学，都是从实际出发，为了革命的需要，为了探索并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语言学新体系，绝不盲从外国或古人。他生前在主编修订《辞海》时，就曾经说过：我们的屁股要坐在今天的中国，一手伸向外国，一手伸向古人，吸收他们一切有益的东西，目的是为了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。这话并不是他的创造发明，不料在十年内乱时被“四人帮”的爪牙们看成是异端邪说，真是从何说起！

语法和修辞都是研究语言现象的，语法是使语言规范化的手段，修辞则更进一步要求语言的美化。修辞本身就体现了说话人的思想见解、实践经验、审美观念、语文修养等等综合因素。语言美和心灵美是密切关联的，一是思想感情的内涵，一是思想感情的表现。所谓“言为心声”，就是最恰当、最简要

的表述，很能说明两者的关系。我认为，在今天出版《陈望道修辞论集》，应当从这样高的角度加以衡量。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十年，祖国语言遭受过一次最大的“公害”，污染程度相当严重，要拨乱反正，恢复语言的健康发展，从而体现语言美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起的促进作用，就需要分两个层次加以考察。

第一个层次是清除粗话、野话和脏话。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。由于某种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人对人的不平等关系，一部分人妄自尊大又滥用特权时，另外一部分人则居于受凌辱的地位，象造反派那样踞高临下，盛气凌人，以极端污秽野蛮、不堪入耳的粗话、野话和脏话对待所谓牛鬼蛇神，例如“你竖起狗耳朵来听着”、“砸烂你的狗头”等等，就被误认为是“革命的语言”了。这真是肉麻当有趣，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！毫无疑问，这种语言的污染，必然影响人与人的正常关系。提倡语言美，首先必须彻底清除这种语言的污染现象。

同时，多用敬语，对人表示尊重，也是很必要的。不管是什么人，都不能以“特殊”或“高人一等”自居，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平等、友爱的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身份，不能“昂首天外”自以为是，去任意贬低别人。要随时随地尊重别人的劳动，当别人帮助过自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应该说声“谢谢”。“谢谢”两个字在人们心目中所引起的反响是难以形容的，它把人与人的关系拉近了，感觉亲切甜润，滋味无穷。

清除语言污染和多用敬语，只是初步的，因而也是比较低级的。

第二个层次是真正要体现语言美，即要求语言合乎其本身的内在规律，更加注意它的社会效果。社会主义“四化”建设，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加强了，工作、学习、交往进一步密切了，急需民族共同语作为交际工具。这种全国性的交际工具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、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、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。语言美是包括社会效果在内的，推广普通话，提高语言的社会效果，正是符合语言美的要求的。绝不能设想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人们都说各自的方言，使思想感情无从交流，还能谈得上什么语言美。

语言是有继承性的，简炼的成语可以丰富语言美的内容，例如恰当地运用成语，能够起到历史联想作用，增加语言的形象化，而且还能够避免词费，做到“言简意赅”。吸收古代有用的语言成分，学习群众口头上的生动语言，同时利用必要的外来语，只有语言丰富多采了，语言才真正是美好的，如果干巴巴地象个瘪三，语言无味，是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语言美的。语言美又是建设精神文明所必不可少的因素，我们应当在这一方面多进行探索和研究。

陈望道同志对语法、修辞研究的成果，是一份宝贵的财富，它是建设语言美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藏，可以供我们发掘和运用。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，然后才是一个多方面的学者，两者兼而有之，才充分发挥了他的光和热。我认为这也正是陈望道同志的难能可贵之处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。

陈望道同志逝世已经七个年头了。我们在上海语文学会和修订《辞海》的工作中，长期共事，他那艰苦朴素、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，认真、刻苦、精细、扎实的学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他是我的良师益友，在这本论集出版的时候，谨以

这篇序言作为永恒的纪念。祖国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，陈望道同志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，一定会在第二代、第三代的手里完全实现，因此，他也应当含笑九泉了！

1984年新春

目 录

编辑说明·····	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	〔 1 〕
高屋建瓴 势如破竹·····	罗竹风	〔 1 〕
——为《陈望道修辞论集》作序		

· 1921年 ·

文章底美质·····	〔 1 〕
——在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讲演	
谈韵律·····	〔 6 〕
感谢大白君申说补足我底《谈韵律》·····	〔 8 〕
官能底交错·····	〔 12 〕
语体文欧化的我观·····	〔 13 〕

· 1922年 ·

《作文法讲义》（小序与第一至第五章）·····	〔 14 〕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· 1923年 ·

对于白话文的讨论（一）·····	〔 35 〕
对于白话文的讨论（二）·····	〔 37 〕
文言白话和美丑问题·····	〔 39 〕
对于白话文的讨论（五）·····	〔 41 〕
方言可取的一例·····	〔 43 〕